



中国城市的郊区增长

沈洁 著

非外借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郊区新城的空间生产研究：机制、模式与调控”（41401140）、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郊区新城的社会融合研究：社会空间的视角”（13PJC016）

资助出版

中国城市的郊区增长

沈 洁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的郊区增长/沈洁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1672-5

I. ①中… II. ①沈… III. ①郊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上海市 IV. ①F1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889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城市的郊区增长

沈洁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72-5

2016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4

定价:38.00元

序 言

中国城市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城市的快速扩张,人口向城市外围迁移、扩散。长期以来,学界把这种过程称为“郊区化”,对人口的空间再分布做了详尽的实证研究。以北美郊区为原型的郊区化研究指出,低密度、独栋住宅为主的居住导向的郊区化,在向后福特主义灵活生产的经济转型后,出现了工业和服务业的扩散,使得郊区成为居住、消费、生产的综合体,即所谓“后郊区化”。

最近,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郊区的治理,发现郊区呈现出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变化。北美郊区表现出地方商界和居民脱离中心城市政府的管制,而出现了地方自治、政府亲商的局面,因此被认为郊区化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化。在特定的北美城市背景下产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未必适用,但是他们所运用的政治经济视角还是富有启发。其实,西方激进地理学很早就指出,郊区化不仅仅是居民选择郊区优雅生活环境的结果,而是由国家力导的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循环的一种手段,以及针对生产过剩、资本循环堵塞进行的空间修补方式。近来,国内学者也尝试运用空间生产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城市化。

沈洁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适逢 2000 年后上海提出“一城九镇”,与之前零星的郊区地产开发不同,郊区化进入以新城发展为核心的新阶段。她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上海的新城建设,特别是以松江新城为案例,对现阶段中国郊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空间形态做了深入研究。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相对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具体的中国新城建设相结合,重新审视了郊区作为资本积累的空间的假说,通过对新城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分析了居住和迁移的原因,探索新城战略的实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及与居民择居的结合,共同推动了新城的发展。该研究确认了郊区化不单纯是居民择居的结果(但确是新城发展的动力之一,不应忽略);也进一步确认了市场化转型下,中国的新城发展呈现出新的治理模式,特别是以土地出让为核心动因的城市扩张发展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同时又参与市场、干预市场的复杂治理方式。

该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否定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指出中国城市在转型期的复杂动力机制,集合了市场、国家和地方等多种因素,由此空间上也呈现了复杂、多元局面。新城既有以选择环境优质的第二居所为主的动因、又有购买地铁沿线较为廉价自住住宅的实际需求,有郊区老镇居民为了改善居住而迁入,也有随着大型工程(如大学城)而生的住宅区,还有为工业开发区而配套的外来人口非正规居住区。这种复杂的新城建设,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卫星城镇建设不同,也和以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为主的住宅郊区化不同,呈现了另

一种“后郊区化”形态。

本书体现了沈洁博士的高屋建瓴的立意,和扎实、严谨、深入的研究风格,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治理的研究做出了及时且重要的贡献。本书的出版将填补中国郊区化研究在该领域的空白,也将成为今后中国城市研究的重要文献。在专著问世之际,沈洁博士作为英国经济与社会基金项目的合作者,承担“未来之城的治理”研究课题,对上海进一步展开大型城市建设的治理创新的研究。欣然作序,期待她取得更大成就。

吴缚龙

巴特雷特规划讲座教授

伦敦大学学院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标	2
第三节 内容概述	4
第二章 全球郊区化图景中的中国郊区	6
第一节 全球郊区化的演进与理论重构	6
第二节 中国城市的郊区增长研究	16
第三节 郊区作为资本积累的空间	20
第四节 建设郊区:增长机器和城市体制	25
第五节 住在郊区:郊区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吗?	31
第六节 小结与讨论	37
第三章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38
第一节 研究框架	38
第二节 研究问题	41
第三节 研究方法	42
第四节 数据分析方法	47
第五节 小结	48
第四章 郊区化与新城政策的资本逻辑	50
第一节 结构性变化与郊区开发新模式	51

第二节	上海郊区开发历史	59
第三节	郊区开发新策略及其资本逻辑	61
第四节	郊区开发项目及其实施	65
第五节	新城政策下的城市空间重构	80
第六节	政府主导的中国郊区开发	84
第七节	小结与讨论	90
第五章	城市企业主义下的郊区开发	93
第一节	城市企业主义在郊区兴起	97
第二节	松江新城的企业式开发	100
第三节	城市企业主义下的郊区新城开发模式	109
第四节	新城开发与郊区增长机制	125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131
第六章	郊区增长的需求驱动	134
第一节	郊区住房市场的需求增长	135
第二节	郊区的空间分异	142
第三节	异质的松江:实证研究	148
第四节	小结与讨论	170
第七章	结论	174
第一节	中国郊区增长的动力机制	175
第二节	中国的郊区:后郊区化的新类型	181
第三节	理论与政策启示	187
附录 1	实地访谈受访者列表	190
附录 2	调查问卷	193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2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中国的郊区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周边主要是辽阔的农村地区,其间零星分布着工业卫星城和小城镇,由于人口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城市与其周边地区鲜有互动。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城区开始逐渐向外扩张,城市边缘地带成为充满活力的区域,同时容纳了工业开发区、大规模居民区、打工者聚集的城中村和未开发的农地等(Cartier, 2001; Deng and Huang, 2004)。早期相关研究将改革开放后郊区的巨大发展归因于一系列体制改革,如行政权力下放以及土地和住房市场的建立(Zhou and Ma, 2000; Zhang, 2000; Logan and Zhou, 2008)。2000年以来,具有综合城市功能的郊区新城,成为中国郊区化的新空间模式(Wu and Phelps, 2008)。此外,中国郊区的新一轮发展中,不断出现了科技园区、别墅型门禁社区和大型郊区购物中心等新景观元素。大都市区正逐渐演变成多中心的空间结构(Feng and Wang, 2009; Yue et al., 2010)。

近来有不少研究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尝试做出解释。有研究强调政治经济因素,Feng等(2008)认为,市场力量开始对中国郊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Wu和Phelps(2011b)指出,郊区具有综合节点功能的产生,是企业家型城市政府(entrepreneurial municipal government)扩大城区范围的结果。也有研究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关注郊区门禁社区的

学者指出,住房消费对当代社会转型起到积极作用(Fleischer, 2010),门禁社区的兴起,表明中国新富阶层对优质生活愈加强烈的需求(Pow and Kong, 2007; Zhang, 2010)。Wu (2010)阐述了近年来开发商如何将郊区居住生活作为新生活方式进行包装和宣传以吸引购房者,并指出这对推动中国的郊区化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尚且缺乏对当代中国郊区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很多重要的问题仍有待探讨:郊区化为什么会演变为目前的形式?郊区化在中国是如何实现的?郊区的居民包括哪些群体,他们为什么在郊区定居?如何解释中国郊区的新元素与西方郊区的相似性?本研究将以上海及其远郊区松江为例,探究上述中国郊区发展中需要解释的问题。

第二节 研究目标

本研究主要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全面阐释当代中国郊区增长的动力机制。中国郊区化研究领域的既有成果较多关注人口再分布和城区扩张的空间模式,而鲜有阐述郊区发展的关键过程及其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生产方面,虽然政府在郊区建设过程中毫无疑问处于主导地位,但究其原因、政府与其他行为主体互动的方式以及整个过程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在消费方面,商品房已成为住房供应的主要类型,居民可以自主选择居住地点和方式,但是关于居民的住房偏好对郊区空间形成作用的研究并不多,推动郊区快速发展的需求因素仍不清楚。因此,需要以实证方法分析郊区的新形式和新功能,揭示其背后的推动因素。

特别地,本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入手,引入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剖析当前中国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发展,弥补现有郊区化研究中对制

度因素与相关行为主体角色考虑的不足。从空间生产的视角来看,空间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且具有价值与社会内涵;研究焦点从空间本身转向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以及政治特征(Lefebvre, 1974; Harvey, 1985)。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对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在西方城市研究中早有传统,相关理论不断丰富完善。从较早的 Walker(1981)、Harvey(1985)到最近的 Cox(2010)与 Peck(2011),将郊区化过程视为资本主义内生的一种“时空修补”(spatio-temporal fix)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a solution to capital crisis),为解释西方城市在战后的大规模郊区化和最近的城市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以此为出发点,亦涌现出大量对行为主体通过塑造郊区化过程以促进资本积累的理论与实证研究(Logan and Molotch, 1987; Phelps and Parsons, 2003; Knox, 2008)。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刻地揭示中国当前郊区化形式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相关理论对城镇化过程中不平衡发展等问题富有政治社会关怀的批判态度,对于认识当前中国城镇化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研究的另一个目标,是将中国郊区置于全球的(后)郊区图景中进行研究。目前的郊区理论主要是从对欧美国家的郊区发展研究而来。然而,郊区化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现象,这一点已得到广泛认同(Clapson and Hutchison, 2010; Phelps and Wu, 2011)。并且,很多新兴国家的郊区呈现多样化、而非趋同的发展轨迹。现在亟需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框架,来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郊区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如 Harris (2010: 17) 所说,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之间建立联系,并对以发达国家为基础建立的郊区理论进行重构。这个意义上,中国郊区提供了重要案例。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但是体制和社会转型方式却不同于东欧

后社会主义国家或新兴的东亚、东南亚国家。随着人口与资本向郊区扩散,郊区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最前沿。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中国郊区的发展,为丰富世界郊区研究做出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郊区化”(suburbanization)这一现象从诞生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城市典型的由于内城人口迁出而形成的、以居住功能为主的中产阶级郊区(middle-class suburbia),已经不再是郊区发展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郊区的研究,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郊区发展的形式与轨迹多样且复杂。因此,最新的郊区研究强调,如果仍将郊区化狭义地定义为西方城市战后的郊区发展模式,不利于对这一现象的深入了解和剖析,造成认识上的局限与偏狭(Harris, 2010)。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从广义上界定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和郊区增长(suburban growth)的内涵,即伴随城市空间扩张过程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化地区边缘的增长(Ekers et al., 2012)。特别地,就中国城市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郊区发展逐渐通过撤县设区、区县合并和新城建设向远域空间延伸,研究将聚焦于对这一过程的深入剖析,揭示当前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深层次规律与机制。

第三节 内容概述

全书共分为七章。本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介绍研究的理论背景,并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首先,分析世界各地郊区发展的不同模式,提出有必要突破经典的美国模式,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提出郊区的概念。随后,重点介绍中国郊区化的现有研究,并指出中国的郊区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这一现象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均未得到深入理解。最后,根据现有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建立研

究中国郊区动力机制的框架。

第三章根据研究框架提出问题与假设,同时对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进行详细说明。本研究基于大量的一手和二手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方法进行分析。丰富的资料来源和有效的分析方法为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也为解答研究问题提供了坚实且富有创见的视角。

第四章旨在从资本积累的角度阐释上海郊区的新一轮发展。上海市政府推动了新城开发的郊区化新模式,本章通过回顾和分析新城政策,探讨了新城发展变化的原因、战略、政策及实施情况,说明政府通过郊区发展促进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本章还通过宏观统计数据,描述了上海这一大都市的空间结构,进而评价了新城规划的整体效果。

第五章和第六章对松江进行深入研究。第五章重点研究政府主导的企业式管理下的松江新城建设。本章首先分析了当地政府将新城建设作为其重大企业型战略的制度背景和原因。通过深入考察分析三大旗舰项目的开发过程,揭示了该战略如何在新的开发模式中实现。最后,分析过去十年中经济结构和资本投资的变化,阐释郊区化的增长机制,即新城作为增长机器如何发挥作用。

第六章探讨了影响松江发展的需求驱动因素。本章首先概述了基于需求的增长动力机制以及居民的主要类型,随后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调查数据分析郊区居民和空间模式的异质性。本章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指出不同人群在社会经济属性、居住偏好和居住地点方面的巨大差异。此外,还根据采访进行定性分析,进而解释定量分析的结果。

第七章对实证研究进行总结。首先根据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解释研究问题,并对中国郊区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模式进行比较和理论概括。最后,阐释了郊区发展对中国新城市主义以及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广泛意义。

第二章 全球郊区化图景中的中国郊区

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形式与进程正日益成为当代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郊区的概念不仅随时间演变,而且在不同地域背景下具有不同含义。现有郊区理论由欧美国家发展经验而建立,中国郊区的快速发展及其独特模式为重新思考全球郊区增长的模式提供了一个重要实例,本书的核心工作即在于阐述推动中国郊区发展的普遍因素和特定因素。

本章将回顾中国郊区实证研究的理论背景。首先,概述全球范围内的郊区发展模式,指出不应仅以美国的郊区化模式作为标准,而应在特定地域背景下对郊区增长进行解释。其次,回顾中国郊区研究的现有文献,阐述全面理解中国当代郊区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最后,根据相关理论和实证结果构建应用于本研究的中国郊区分析框架,并分主题展开论述。

第一节 全球郊区化的演进与理论重构

一、经典的美国郊区理论

一般说来,“郊区”(suburb)指城市的边缘区域。在追溯郊区起源的研究中,Harris 和 Larkham (1993:3) 阐释了由“sub urbe”演变而来

的术语,即“靠近城镇(sub)或发展成为城市前的中心(urbs)”。尽管“郊区”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尽相同,但在经典的美国郊区理论中,倾向于将郊区描绘为“中产阶级聚居地”(同上:6)。就物质形态而言,郊区常表现出居住形式单一、低密度的特点;在社会结构上,郊区吸纳了有着特殊生活方式的富裕家庭。因此,郊区生活成为中产阶级乌托邦的象征(Fishman, 1987)。

从上述认识郊区的传统观点出发,近年来美国郊区发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新现象。随着就业的急速分散,出现了被称为“边缘城市”(edge cities)(Garreau, 1991)、“技术化郊区”(technoburbs)(Fishman, 1987)、“无边界城市”(edgeless cities)(Lang, 2003)和“后郊区”(post-suburbia)(Teaford, 1997)等位于城市边缘的综合性功能中心。在此类新兴郊区中,原来以中产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在郊区共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融合。中产阶层的居住开发,进一步演变成经过整体规划的门禁社区(gated and master-planned communities)(Blakely and Snyder, 1997; Low, 2004; Knox, 2008),与附近工人阶层聚居的棚户社区形成鲜明对比(Davis, 2006)。当代的郊区发展,实际上加剧了社会极化和社会隔离(Low, 2004; 2008)。

Wu 和 Phelps (2008)总结了“后郊区化”发展的特征。首先,在新模式下,近郊地区逐渐衰败,远郊地区蓬勃发展。其次,新开发互相脱节、缺乏衔接,呈所谓的“拼贴结构”(patchwork structure),由于城郊两者的差异日益模糊,确定城市的边界变得十分困难。再次,后郊区的空间生产同样包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是公私部门之间更为复杂的合力作用结果。最后,后郊区的住区更好地实现了职住平衡,与之相匹配的,土地混合利用是后郊区的共性。

Soja (2000)指出,以“后郊区化”的形式向外扩张,是城市空间重

构的过程,也是城市化进程的新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城郊两者的密度与功能愈发趋同。曾经相对同质的郊区正变得更加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而多样化曾经一直都被视为中心城区的特征。因此,城市开始由内向外逆向发展。Soja 用术语“expolis”[一语双关,解释为“外围的(exo)城市(polis)”和“polis(城市)exo(不再)具备原来的中心性”]来描述没有中心的新城市化形态,并认为这是城市化从单中心都市区化向区域城市化转变的新阶段。

然而,很多研究都试图对以上关于郊区发展的既有论述进行梳理、修正。不少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显示,媒体和学术研究都夸大了郊区的同质性,传统的关于郊区是中产阶级居住地的大量描述并不可靠。有研究表明(Harris and Lewis, 1998; Lewis, 2004; Harris, 2004; Kruse and Sugrue, 2006),制造业的分散化和工人阶层在郊区定居,从19世纪中期至今一直存在。Hayden (2003)在聚焦居住开发的讨论中,梳理了七种具有不同发展方式和建筑风格偏好的郊区化模式。这一研究再次表明,不应将近年来的郊区转型视作全新现象。也有学者认为(Hise, 1997; Walker and Lewis, 2001),诸如边缘城市的发展趋势,在早期的城市模式中就出现过。“边缘城市”概念的提出,只是试图解决美国人一直以来对“城市”摇摆不定的价值判断问题而已(Beauregard, 1995)。

二、美国范式之外的全球郊区增长

(一) 欧洲城市的郊区增长

与北美特别是美国不同,欧洲大陆的城市开发模式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在城市中心而不是边缘区域建筑中产阶级乌托邦(Fishman, 1987),最典型的例子是路易·拿破仑和奥斯曼改建的巴黎。同时,工人阶级的郊区,俗称“banlieues”,是政府为工人建造的社会住房。如

今,这些郊区社区仍是贫困移民尤其是北非移民的聚集地(Wacquant, 2008)。和法国一样,其他许多国家在郊区为工人阶级建造公共住宅,由此十分相似的发展出自上而下的集中式郊区化模式。

然而,欧洲城市常被学界视为美国城市的变体,因为欧洲郊区和美国郊区有着很多共同要素,包括郊区生活理念、同质化景观和私人家庭生活等(Harris and Larkham, 1999)。例如,霍华德(Ebenezer Ed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和半乡村生活理念,对战后英国的新城项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Clapson, 2000)。此外,建立在房屋私有化基础上的郊区生活理想在工人阶级中普及之后,便引发日渐流行的自发式郊区化。近年来,针对欧洲边缘城市的研究相继问世。尽管这些城市的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尽相同,但其功能和发展过程都符合“边缘城市”的定义(Nuissl and Rink, 2005; Bontje and Burdach, 2005; Phelps et al., 2006)。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北美与欧洲城市郊区化的主要区别仅在于郊区化发生时间和发展速度有所不同(Mazierska and Rascaroli, 2003)。

(二) 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郊区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郊区化模式与发达国家城市大相径庭。伴随着快速的城市扩张,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郊区呈现出人口密度高、城乡交错混合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郊区景观。为了在城市谋求发展,从乡村以及小城镇涌入的移民聚集在城市边缘,形成大量棚户区。在拉丁美洲(Caldeira, 1996; Losada et al., 1998)、现代非洲(Simon et al., 2008)、南亚和东南亚(McGee, 1991; Kundu et al., 2002)的城市里,这种现象十分突出。McGee (1991)创造了“desakota”一词来表示城市外围密集居住区的发展,该词取自印度尼西亚语,其中“desa”表示乡村,“kota”表示城镇。

然而,这些城市边缘区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